

明朝时期中、日、琉球关系研究

柳岳武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摘要: 明际中、日、琉球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对此后的中日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明廷在前期以及中后期对琉球的一系列不当政策导致了琉球与日本联系以及日本对琉球控制的加强。日本对琉球由此前的陌生、淡薄转化为对它的积极进取与控制。随着明末国家实力的衰落,以及明廷对琉球采取保守的宗藩政策,日本在琉球的优越地位日益上升。这一地位的上升是日本在东亚执行对外积极扩张政策的开始。日本正是以琉球为起点开始走上奴役东亚邻国的道路。

关键词: 中国;日本;琉球;明朝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6)04-0025-10

The study about the relations among China, Japan and RyuKyu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LIU Yue - wu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relation among Sino - Japan, Sino - RyuKyu, Japan - RyuKyu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had made a deep influence to the three countries. A series of inadequacy policies of Ming Dynasty to RyuKyu during the Ming caused the relation of Japan - RyuKyu had closed, at the same time Japan tightly controlled the RyuKyu. The unfamiliar conditions of Japan about RyuKyu had changed. Japan began to adopt a radical policy to RyuKyu. Accompanying with the real strength of Ming decline and the conservative policy to RyuKyu, the superiority of Japan in RyuKyu was rising increasingly. The statue rise of Japan in RyuKyu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expansion in the Far East. Through the point of departure of RyuKyu, Japan began to walk the way of enslaving his neighbors.

Key words: China; Japan; RyuKyu; Ming Dynasty

1874年,日本承袭西方殖民主义政策吞并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东亚古国琉球,此后日本将它变成了自己的冲绳县,自此琉球作为一个国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不复存在,它的辉煌的海上贸易也成为了历史的陈迹。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吞并琉球,除了日本因受西方扩张政策之刺激,而仿照西方通过奴役比日本弱小的邻国来提升日本在国际的等级地位外^①,还与日本自明中后期后同明中国争夺亚洲的宗主权密切相关。只是与中国传统的、建立在友好基础以及厚往薄来的宗藩体制不同,日本从一开始就走向了对外扩张与追求国家最大经济利益的道路。研究明际中、日、琉球三国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一方面有助于人们看清日本东亚政策发生变化之本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弄清清际以及近现代时期日本东亚政策的主要变化。

一、明朝中前期的中、日、琉球关系

(一)明朝中前期的中琉关系

明政权建立后,明太祖一方面出于“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即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而将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爪哇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②;另一方面他又派出使者四处宣谕,宣扬自己

^①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The Japanese Penetration of Korea, 1895 - 1910, Peter Duu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P14.

^② 《明宣宗实录》卷32,宣德三年二月条。

的德化天下之治,并要求各国来朝。洪武五年(1372),明廷派行人杨载携诏书谕琉球王。中山王察度遣弟秦期赴明进贡。太祖赐大统历,此后明朝与琉球建立了真正的宗藩关系。不过,在此有一点值得思考。如果中琉关系是在明朝才开始建立直接的官方关系,那么杨载又是如何将诏书送到琉球国的,而又如何知道它是琉球而不是隋、唐、元时期的台湾或澎湖列岛呢?而要解决这一难题则有两种可能。第一,或许如《隋书》陈陵传所称,隋时,中国人真的到达了琉球国,而其后中国人也经常到达琉球国,只是因为中国史书因承袭前人的错误,而将《隋书》的东夷列传中的“流求国”错误一直传抄下来。因为中国史书、笔记中这种错误是非常常见的,即使是到了明清时期即中琉交往非常密切时,还有人犯出将澎湖列岛画归“琉球国”这样的错误。而《西洋朝贡考》①、《武备志》②就是其中的代表。第二,可能中国在隋代后的某个时间内已经与琉球发生了交往,只因人们误将台湾当成琉球,而无法将真实的琉球国称之何名。

以上的解释目的在于说明一点,即只有在明代之前中国与琉球已经发生了直接联系的前提下,才会有洪武帝的一纸诏书能令琉球中山王应命来朝的可能。

1、中琉宗藩关系的发展与主要内容

明初,随着洪武帝对外采取开放的方针,明朝同琉球的关系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并且交往的领域非常广泛。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朝贡和册封关系

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遣弟秦期赴明进贡,从而开始了明朝与琉球的朝贡活动。明廷赐给琉球中山王大统历。这一做法,从中国传统的宗藩理论上,表明了两点。第一,琉球正式被明朝接纳为属国,并被明朝所承认。第二,明朝对琉球实行宗主权并被琉球所接受。即大统历的赐予与接受这一活动本身就暗含以上两层意思,并且表明了中琉宗藩关系的正式确立。而后,琉球于洪武七年再次进贡。在中山王察度的刺激下,琉球的山南王于洪武十一年赴明进贡,以此来赢得明朝的认可和支待。在琉球国内三王分立的情况下,琉球各国王出于寻求自身的“法统”合法性并达到提高自身声望的双重目的而纷纷与明朝交好。至洪武十六年,中山王、山前王同时进贡,洪武帝诏赐两王金銀印,并且出于帝王“和夷万国”的目的,专门派内史监丞梁民教令三国罢兵息民。在这一系列活动的刺激下,山北王帕尼芝也于该年遣使进贡。因此到了洪武十八年,出现了琉球三王共同向明朝进贡的局面。太祖又赐山北王金銀印并加以册封。

洪武三十年之前,明廷对琉球的册封方式如何,是否派出册封专使?因资料丧失而无从知道。但是从永

乐二年开始,有资料证明明朝派出了正式册封使。嘉靖十一年即陈侃出使琉球之前,明朝派往琉球的册封使节为10次,而此后至明朝灭亡为5次,共为15次。具体情况参见表1。

表 1:明朝永乐年后遣往琉球册封国王表

时间	册封使	册封对象	间距时间 (与上次册封)(单位:年)
永乐二年 (1404)	时中	中山和山南王	不清
永乐十三年 (1415)	陈季若	山南王	12
洪熙元年 (1425)	不清	中山王	11
正德四年 (1442)	余忭、刘逊	琉球国王	18
正德十二年 (1447)	陈传	琉球国王	6
景泰二年 (1451)	乔毅	琉球国王	5
天顺元年 (1457)	严诚	琉球国王	4
天顺六年 (1462)	潘荣	琉球国王	7
成化七年 (1471)	官荣	琉球国王	9
成化十四年 (1478)	董旻	琉球国王	7
嘉靖十一年 (1532)	陈侃	琉球国王	54
嘉靖三十九年 (1560)	郭汝霖	琉球国王	28
万历四年 (1576)	萧崇业	琉球国王	16
万历三十三年 (1605)	夏子阳	琉球国王	29
崇禎二年 (1629)	杜三策	琉球国王	24

而另一方面琉球也向明朝进贡,如果从洪武五年(1372)至成化十一年(1470)按一年多贡的最大值四贡算为408次。而成化十一年至正德二年应明朝要求改

① 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考》,转引自柯培元:《流求与鸡笼山》,台湾文献史料集刊,第2辑,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51页。

② 茅元仪撰:《武备志》,转引自柯培元:《流求与鸡笼山》第2辑,第56页。

为两年一贡算为16次^①，而正德二年至嘉靖二年又按明朝要求改为一年一贡算为17次，嘉靖二年至万历三十七年按明廷要求为十年一贡算为1次。而万历三十七年至崇祯二年进贡一次，共计为486次^②。

这些册封与朝贡活动无形之中加强了明朝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只是到了丰臣秀吉时期这一宗藩关系才受到来自日本的威胁，但是从总体上看，册封与朝贡的互动不仅推动了明廷与琉球国上层统治阶层之间的联系，而且也促进了双方的交流与经济上的发展。

(2) 明廷与琉球经济贸易交往

明洪武初年的政权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持较为开放的态度，在与琉球的贸易中也持比较积极的姿态。洪武九年，太祖命刑部侍郎李浩齐到琉球赐纹绮，并且带去陶器七万、铁器千到琉球国互市马和硫磺^③。其结果是国王遣奏称“从浩入，贡马四十四”。此后，明廷类似此举的主动贸易行为不再发生。其间的主要原因是琉球国小地贫，无法消化明朝运去的商品，而使明朝方面这一主动的商品交易行为从此终止。但是另外两类贸易却照常进行着。其一为中方的册封使进行的琉球贸易，另一类为琉球贡船到明中国的贸易。自永乐二年至崇祯二年，明朝派往琉球的册封使共为15次，如果按照洪武间许过海五百人、行李各百斤与琉球人贸易着为条令的会典性条文看，明朝到琉球的人数共为7500人左右，贸易货物量约为750000斤左右。如果参照康熙甲午年使行人一次所得货币量共为1万两白银计算，则明朝自永乐二年后从事琉球的册封使贸易所得货币量约为15万两白银，如果参照康熙二十二年使行人所得货币量为6000两白银计算，也得9万两白银。当然由于资料的欠缺，以及每次贸易所得资金不尽相同，每次肯定有所出入，但在总数上应该是接近的，即肯定能在9至15万两左右。

明朝中方的贸易与琉球相比，当然要小得多了。琉球在明朝来中国朝贡以最保守的数据计算为178次，以乐观的数据计算为486次。如果按照最保守的数据即178次，每次运送1万两白银的货物计算（参照康熙乾隆年间，琉球每年报册为1万两白银货物量计算。参见《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19页。）明朝琉球到中方所从事的贸易额为178万两白银，如果按照较乐观的每次贸易额为10万两白银计算（康熙乾隆年间，琉球每年报册为1万两白银，但实际的贸易额到了乾隆时期多达10万两白银）则为1780万两白银。如果按照最乐观的次数和最乐观的贸易额算则为4860万两白银。当然，贸易额总算不可能达到4860万两白银的。但肯定在178万两白银至4860万两白银之间，这一数据远远地超出明代中方的9万至15万两白银数据。即从明中国与琉球的对比贸易额看，琉球方面从

明中国所得到的贸易利益比明朝所得到的利益要多得多。而且琉球在明中国从事朝贡贸易也无任何关税苛征，因此它为琉球在贸易中提供了其他非朝贡国所难以享受的待遇，它将中国的丝绸等产品运往日本等东南亚各国，从中得到巨额的利润，俨然成为垄断中国货物之海商王国^④。正是因为这样，才引起日本特别是萨摩藩对琉球贸易利润的贪心，意图控制琉球以此得到同中国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

(3) 中琉文化交流与影响

明与琉球之间的文化交流方式是多样的，但其影响较大的交流方式有三种，它们分别是册封与朝贡的活动交流、琉球官学生的留学交流、闽人三十六姓的琉球活动。

明与琉球的交往自洪武五年开始至崇祯二年为止，明朝派往琉球的册封使有资料明确记载的有15次，而琉球到明方的朝贡活动则多达好几百次。双方在这种朝贡与册封活动中促进了文化交流，尤其是琉球更多地吸取了汉文化。这种文化在当时是东方最先进、最具有吸引力的文化。在它的周围所形成的中华文化圈，不仅对琉球，而且对日本、暹罗、安南、高丽等国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而琉球作为与明朝联系密切的、朝贡活动非常频繁的朝贡国，它所受到中原文化的震撼是其他非朝贡国所无法比较的。

中琉在明际的文化交流在朝贡与册封活动中主要体现为册封使在琉球的一系列册封活动，与他们同琉球统治阶层中上层间的文化交流。如题诗、作画等活动中，都给琉球统治阶层以巨大的吸引力。另外，琉球朝贡使行人每次朝贡在广州、福建等地动辄停滞半年或一年甚至几年时间，也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与机会了解明中国的汉文化。

① 何慈毅在《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附录“琉球与日本及明清关系史年表”中将明改琉球为两年一贡的时间定为文化七年。参见何慈毅：《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② 潘相：《琉球入学闻见录》“锡饗”条。“锡饗”条中称：“琉球自明初年来王，朝元旦，庆天寿，谢教谕，贺登极，进香有仪，册封东宫有贺，请封、谢封有礼，遣子入学有例；一岁之内，再至四至。后乃定其年限。”即表明在洪武至成化十一年之间，为一年多至。它可能是一岁一至，也可能是两至，或四至。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25页。

③ 周煌：《琉球国志略》，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版，第49页。

④ 杨仲揆：《中国·琉球·钓鱼台》，香港友联研究所1972年版，第47页。

琉球官学生的入学活动,对明季中琉之间文化的交流以及宗藩关系的深化也起着重大的影响。参见表 2。

表 2:明季琉球官学生入学一览表

入学时间	人员姓名	闽人三十六姓或非闽人子弟	归国后官职
洪武二十五年	日孜每、闾八马、三五郎尾、仁悦、实他、卢尾、祝贺志	琉球国王子弟	不清
洪武二十六年	祝志每	中山王臣	不清
洪武二十九年	麻者理、祝志鲁、姑鲁妹(共三人)	中山王臣子弟	不清
永乐三年	李保	山南王臣子弟	不清
永乐四年	石达鲁(共六人)	中山王臣子弟	不清
永乐八年	裸都古(共三人)	中山王臣子弟	不清
永乐十一年	郝同志久、周晋(共三人)	中山王臣子弟	不清
不清	益智每	不清	不清
成化十七年	蔡实	闽人子弟	长史
正德五年	蔡进(五人)	闽人子弟	通事
嘉靖五年	蔡浩	闽人子弟	不清
嘉靖五年	蔡廷美	闽人子弟	长史
嘉靖五年	郑富	闽人子弟	不清
嘉靖五年	梁梓	闽人子弟	长史
嘉靖十五年	梁炫	闽人子弟	正议大夫
嘉靖四十四年	郑炯	闽人子弟	法司
嘉靖四十四年	蔡暹	闽人子弟	通事
万历七年	郑周	闽人子弟	长史
万历七年	郑迪	闽人子弟	通事
万历七年	蔡常	闽人子弟	不清

上述人数就明朝一朝计算,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有 46 人。这些人不仅在留学明朝期间,做到了“严朔望之

仪,谨晨昏之令,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行必谨,言貌必壮,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①,即真正地按照儒家规则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则来规范自己,在个人的修为上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境界,而且在回国后对琉球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郑炯回国后,累官至法司,成为琉球国王的重要权臣,而且得到了国王的宠幸。更为重要的是,自他之后,琉球的法司都为三十六姓人,即对琉球国家的司法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郑炯不仅在琉球国内主张积极与明朝交好、接近政策,而且还是琉球国内对日本势力主张积极抵制的重要领袖人物。在他的倡导下,琉球对日本对它的侵略和渗透进行了有力的抵抗。

明季中琉文化交往的另一重要力量是闽人三十六姓。明洪武年间,明廷出于方便琉球与中国的宗藩交往,特赐琉球以闽人三十六姓者居琉球。洪武年间所赐闽人不及三十六姓,或仅及一半。只是到了永乐年间,因洪武年间所赐闽人人口的减少而再次加赐,两次合计共为三十六姓。而《明史稿》也证明了此点,史称:“又嘉其修职勤,赐闽中舟工三十六户,以便贡使往来。”^②可见当时所赐的是三十六户,而且是闽人中的船工,即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贡使往来,而非传播中原文化。另外,杨仲揆在《中国·琉球·钓鱼台》一书中也称:“考洪武当年移民之动机,纯为协助琉人办理航海人贡之事,故最初移入琉球者,仅为福建长乐一带之船工水手等。”^③但是这些人的后代在琉球却非常活跃,而且在琉球也享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正是他们在琉球创建了文化程度远较琉球人高的久米村,并且命名为“唐营”;并因为三十六姓中“以显贵者多”,后又改为“唐荣”。而且琉球国王也厚其裔,世其爵,故取名“世禄”之义,称之为“久米”^④。这些人的到来不仅对琉球的移风易俗有极大的作用,而且对琉球社会封建化进程以及封建制度的完善都有着巨大的作用。因为史称琉球无三十六姓移民之前“其时栋宇之制,盖犹未备”,而三十六姓移来之后“则闲闲轮矣,阶所轩崇。”

这些三十六姓之人,在琉球极力地宣传明中国的汉文化。就拿久米村的程顺则而言,他著有《中山集》、《闽游草》、《燕游草》、《中山官制考》、《指南广义》等多种著作,这些著作对琉球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琉球官学的重要参考资料。而其中的《中山官制考》则是琉

① 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清代琉球纪录续辑》,台北台湾大通书局 1984 年版,第 123 页。

② 王鸿绪:《明史稿》,“外国列传琉球传”,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8 年版。

③ 杨仲揆:《中国·琉球·钓鱼台》第 25 页。

④ 蔡世昌:《久米村记》,《清代琉球纪录续辑》。

琉球最早的一部政治官制方面的书。另外,久米村的蔡铎则著有《观光堂游草》,蔡温著有《澹园集》、《要务汇编》。他们不仅在琉球著书立说,进行汉学宣传,而且还通过建立圣祠、学塾、制定典制等对琉球社会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程顺则在琉球曾经请建启圣祠、设学塾、立关帝庙,而且琉球国中的典制多为他所创立。而蔡温则“擢任法司,联姻王府,人居首里,食数县采地,世世袭,琉之学人咸宗焉。”^①正是这些三十六姓人在琉球所形成的巨大影响使中琉之间的联系在明朝得到了加强。

2. 明朝中前期明廷对琉球、日本的邦交政策与利弊分析

明初在灭元之后又在中原地区建立了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政权,其汉人文化的优越感使得政权统治者始终以正统地位自居,而且在对外关系中,竭力达到“万邦来朝”、“夷狄于道”的化外目的。因此,明初政权刚建立不久就派出使节出使到明中国周边的各个国家,其名义上是通报汉人政权的建立,而实际上则有招徕来朝的意味。当然这种招徕在明代主要是以自愿的方式进行的。周边各国是否来朝,明廷似乎以一种非常超然的心态来看待它,并且在外交上以“来而不拒,去而不追”的方针来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超然式”邦交方针,明洪武政权明确地将朝鲜、日本等十五国列为不征之国。

明前期政权虽然在邦交上实行“和平”与“自愿”的邦交方针,但这不等于明政权在建立自身的华夏秩序时实行消极的做法。相反,明朝中前期在建立同周边国家宗藩体制上却体现出非常积极的姿态,其主要表现为对琉球与日本关系上,它很好地凸现出这种积极的作为。洪武五年,洪武帝就专门派杨载诏谕琉球,结果是中山王察度首先遣使来朝。随后山南王、山北王在中山王这一来朝行为的刺激下也纷纷来朝。明政权对他们实行普遍承认政策,并且以“先王之制,荒服者王,其国之制度胥听其便,不强使同”的传统,对此三王内部的争端实行不干涉政策;而且又以天子姿态,对他们的争斗进行调节,其目的是出于“罢兵息民”即安抚天下众生,并实现其天下共主的角色。

正是因为明政权对属国实行“和平”与“不干涉”政策,所以它对琉球为代表的各国交往也不加任何干涉,听其自便。如成祖时,暹罗船往琉球,遭风漂到福建后,布政司籍记所“有所谓命”时,成祖的谕旨是“暹罗与琉球通好,自是番邦美事,岂可乘其危而利之!乡有善人,尤能济困,况朝廷统御天下哉。”明朝正是在天下一统观思想的支配下,对暹罗与琉球的交往抱支持态度,不仅支持而且鼓励这种属国间交往的发展。明廷命令所司,“舟坏,为之修理,人乏食,给以粟,或归或往

琉球,俟风便,导之去。”^②

明初政权不仅允许琉球国同暹罗、安南等国从事贸易往来,而且也允许琉球与日本发生交往。洪武二年,太祖就命令杨载前往日本递送国书,并且称“明朝来廷,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征之耳”,并对倭寇侵扰山东一事进行了责问。日本南朝的怀良王因忌明朝语气傲慢而未加理睬。洪武三年,明廷又派赵积出使日本,向怀良王阐述了明太祖的对外邦交政策为各国安好,而非攻伐,日本南朝的怀良王才派出僧侣祖来等来到明朝报聘。洪武五年,明廷派出僧侣祖阐、克勤等出使日本。在行前,太祖给他们的训语更鲜明地体现出明中前期对周边国家的“和平”邦交政策。太祖要求他们“人为佛弟子,出为我朝使……是法皆平等,语言体彼此”^③。祖阐等人到日本后向日本的天台宗座主遵道写信,要求“告(日本)王知之,大国之民数寇我疆,宜禁止”^④。明与日本的邦交在祖阐等人的努力下于1402年建成,此后双方为防止倭寇从中破坏实行了勘合贸易政策。日本从这一贸易中获物颇丰,每艘遣明船,从中国载回价值三至四万贯的货物,转手得纯利可达一万贯左右^⑤。

但是明初对日本、琉球的和平友好的邦交关系却不时受到了日本内部势力的干扰。1408年,足利义满去世后,代之的将军足利义持反对向明朝称臣纳贡的做法。他于1419年断绝了同明朝的“宗藩关系”^⑥。但是明廷并没有放弃与日本恢复关系的努力。宣德七年,明宣宗因“日本久不来贡”,特遣内官柴山带敕至琉球国,命令琉球国王派人往日本,谕令日本朝贡^⑦。明宣宗敕谕琉球国王尚巴志时称:“朕闻王□与日本国接壤,商贾往来,道路无阻……王宜遣人赍去与日本国王,令其遣使往来和[好]及买卖生理,同享太平之福”^⑧;并力求中山王尚巴志于宣德九年五月派柴山等

① 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清代琉球纪录续辑》第94-95页。

② ⑦ 周煌:《琉球国志略》第52-53、58页。

③ [日]伊藤松:《邻交征书》,图书刊行会1975年版,第140页。

④ [日]瑞溪周训:《善邻国史记》,转引自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第28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⑤ [日]佐佐木银弥:《海外贸易和国内经济》,载历史学研究会编:《讲座日本史》,1971年版,第180页。

⑥ [日]竹内理三等编、沈仁安等译:《日本历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6页。

⑧ 杨亮功等主编:《琉球历代宝案选录》上,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75年版,第1页。

人乘船三只前往日本国开读教谕^①。在琉球国王尚巴志的斡旋下,再加上足利义持于 1428 年去世、新将军足利义教迫于幕府财政上的困难,被迫与明朝恢复贸易交往。新将军足利义教于 1432 年与明朝重新恢复了宗藩关系,并且双方签定了《宣德勘合贸易协定》,规定日本国为十年一贡^②。在这一时期中日交往中,琉球充当了中介。笔者认为,明廷让琉球充当中日交往的中介与日本进行交往,客观上加速了明中后期日本对琉球的了解和控制。因为在此之前,琉球与日本幕府之间基本上没有官方的正式交往。宣德四年尚巴志统一琉球后,也无琉球与日本幕府间的直接交往。虽然日本方面现存的琉球国王致日本萨摩藩岛津氏最早的一封信的日期日本方面判定为 15 世纪 20 年代左右^③,但是这不能作为尚巴志统一琉球前琉球国与日本交往的证据,更不能看成是与幕府间的两国交往证据,因为该书信的时间年代不详,并且信末的朱印印文也不清楚。但是自宣德七年明廷命令琉球国带教谕日本后,琉球与日本的官方交往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到了正统五年(1440)尚巴志卒,子尚忠立时,明廷虽于正统七年(1442)派遣册封使对新国王进行了册封,日本的将军义教却在琉球与明廷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将琉球赐给了萨摩藩守护岛津忠国为附庸国。日本将军为何在此时重视琉球地位,一方面是明廷让琉球代明朝宣谕日本,而使江户意识到琉球小国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明中国允许琉球、日本的交往使日本了解到琉球在这一朝贡贸易过程中所获得的巨大利润。这些因素都引起了萨摩藩甚至日本幕府的重视。日本开始竭力控制琉球。就这一后果来说,明宣德年间的琉球宣谕日本行为在客观上加速了日本对琉球的了解和控制。

(二)、明朝中前期的日琉关系

明宣德之前,琉球不仅与日本幕府之间没有多少联系,而且同萨摩藩之间也无多少联系的记载。明宣宗虽称“朕闻王□与日本国接壤,商贾往来,道路无阻”,但是官方的交往仍无证据。据现存所有的研究琉球、日本早期关系的史料看,较早指出明季日琉交往时间的是何慈毅著的《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他在附录的琉球日本及明清关系史年表的 1414 年条中有“日本事町幕府足利将军致书琉球国王,对其派遣使节表示谢意。”而具体有时间记载的日琉信件在 1432 年之前(宣德七年)却一件也没有发现。只是到了宣德七年,琉球国王按照明宣宗的要求宣谕日本后,双方的联系才日益加强。正统五年,日本将军将琉球赐给萨摩藩,1461 年左右,琉球国王死,新国王尚德立,就此事,萨摩藩专门派人到琉球进行祝贺。为此事,琉球国王于 1461 年回书致三州太守,表示谢意。除此之外,琉球方面又于 1466 年到日本晋见了足利将军。这表明,日

琉之间的联系在进一步加强。到了 1525 年(嘉靖四年),明帝又一次令琉球进贡使臣郑绳等归国后传谕日本,以擒献宗没,还袁王进等人。琉球使臣于嘉靖九年(1530)进贡时,带来了日本国王源义晴的表文。这一事实再次表明,这一时期琉球所充当的中日信使的角色使得日琉关系进一步加强。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明中前期虽然日琉关系在明廷的触动下有了增强,但是琉球与日本的交往还是以完全平等的身份进行的。即日本将军虽然私自将琉球归属于萨摩藩,其主要用意可能是出于萨摩藩单方面的请求,也有可能是出于便于中日交往的考虑。在实践上,琉日之间仍然以相互尊敬的行为进行着交往。这种相互平等的交往行为在众多的日琉书信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如 1461 年琉球国王尚德即位时,日本萨摩藩派遣使节祝贺,这一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平等国间的行为,而且琉球国王的回信中也体现了这一平等关系。该国王回书称:“国泰民安座于君长生殿,问经武纬赐予太平书,剩承厚赐之领,尤抱三千颜之愧,偏倾丞许之肝胆,虽令珍囊之琼瑶。缎子八疋……浑而十五正奉报也。山砺河滞守于春鱼水约盟,革故竖万岁家邦柱石。台察。’天顺五年六月三日,琉球国王,三州太守麾下”^④。从这书信中可以看出,琉球与日本之间充其量只是友邦间或同盟间关系,而奉明正朔却不用言明。这种日本、琉球间的平等关系一直保持到明末,即无论是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而派人到琉球征收粮米,还是 1609 年萨摩藩入侵琉球之时,琉球与日本间平等的友邦身份并没有改变,它虽然在明后期日益陷入萨摩藩的操纵与控制之中,但就与日本国的国家关系而言,这种相互间的平等身份并没有改变,只是到了康熙初年即琉球国王尚贞执政年间,琉球才开始接受日本的册封,成为清日两重身份下的属国。

二、明朝后期的中、日、琉球关系

(一)、明末对中琉关系产生影响的几个因素

明初,倭寇就开始侵扰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他们于 13 至 16 世纪期间发展猖獗,在日本幕府势力衰落而地方豪强势力膨胀的大背景下,许多破产农民、下级武士纷纷沦为海盗,从事着以武力掠夺为特征的海上掠夺活动。这些倭寇势力在明朝中前期主要以日本人为

① 杨亮功等主编:《琉球历代宝案选录》上,第 2 页。

② 《明史》卷 332《日本传》。

③ [日]相田二郎:《日本の古文书》上,岩波书店 1949 年版,第 753 页。

④ 《旧记杂录》前篇二,第 1370 条,转引自何慈毅:《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第 21 页。

主,到了16世纪后主要以中国东南沿海的海盗为主,即“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①;这些东南沿海的倭寇活动长达3个世纪之久,明朝的实力因此而受到重大的削弱,从而对琉球的朝贡贸易也采取限制态度。

其次,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扰和对琉球的骚扰也影响着明后期琉球关系的发展。丰臣秀吉成为关白之时,在先后平定长宗我部氏和九州岛津氏后,于1590年平定了后北余氏和奥羽地区而统一了全国。这一统一的局面刺激了丰臣秀吉对外扩张的野心。他仿照中国皇帝招徕属国的做法,向日本周边的小国发出“诏令”,要求他们像对中国皇帝那样对待日本,即让日本也达到万国来朝的盛况。同时,丰臣秀吉的军事领主政权在统一全国后,扩张与争夺财富的欲望也进一步增大。另外,国内频繁战争与检地运动、兵民分离政策所导致的大批人民丧失土地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得寻找缓解途径。于是为了缓和国内的压力与掠夺财富以及满足万国来朝的“荣誉”,丰臣秀吉对日本周边国家如朝鲜、琉球等进行侵略。他先后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侵入朝鲜,并于1588年招谕琉球,1591年间派军侵入琉球,强行向琉球征粮。明廷为了应付丰臣秀吉的扩张势力,同时也为了维护自己天下共主的身份和角色,保护朝鲜属国,于1592至1598年间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明廷虽然抵制住了丰臣秀吉的侵略野心,并因丰臣秀吉于1598年死亡而取得在朝鲜半岛上战争的“胜利”,但自那以后自身实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而且这一削弱决定了明后期在日琉关系上只能采取“放任”的政策,而不可能采取任何积极有为的行动,来帮助琉球摆脱日本的控制。

(二)、明朝后期的中琉关系

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和琉球,对明朝与琉球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与日本在朝鲜半岛角逐后,自身实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它开始将政策的侧重点放到安内与巩固自身政权以及防范日本的侵略上。正是基于这一政策的转变,因此它对琉球的命运虽有惋惜和道义上的支持,却无任何实质上的帮助。相反,当丰臣秀吉派人侵入琉球之后,它所表现的更多的是一种消极的抵抗、甚至厌恶而不是积极的对付。另外,促使明朝这一心理变化的因素还来源于日本方面。就明朝而言,它并不甘心与自己有了200多年宗藩关系的琉球遭受日本的控制,而且也不甘心放弃自己的宗主国对属国的保护义务,但是明朝末年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它不得不违心地那么做,那就是日本势力相对于明朝势力而言在琉球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军事、地缘优势。1605年出使琉球的明朝使节夏子阳就真实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在《使琉球录》“国俗”条中称:“教书教武艺师皆倭人,聪警雄俊则不逮倭。器械亦钝朽,且数而已,苟

非恃险与中朝之神灵为倭所困久矣。”而在“御倭”条中称:“夷与倭为邻,而民困国小,有所不足,辄假于倭。每遇册封使远临,在他国或至或不至,倭无不至者;名称往贺,实则索费于其国也。”^②当夏子阳一行来到琉球后,他们又一次亲身体会到日人势力在琉球的嚣张。史称:“及九月间,有数舶至,称为贸易;臣等行令琉球欲为陈兵备御,且严禁从役勿与交通。”同时明人得知日人在琉球势力的膨胀与强大,不仅仅是从耳闻目睹中得到的,而且也是从与日人的直接交锋与较量中感受到的。当夏子阳一行到达琉球后,直接面对日本势力的挑战。《使录》称:“所居馆舍,去天使馆不二里而近;夷虑我众之不善于倭,又虑倭众之不利于我,每为危言以相恐,欲迁我众于营中。”夏子阳一行因考虑到“无故而及迁,是避倭也,岂有堂堂中国而避外夷乎”而坚决拒绝。但是随后日人和明使双方果然发生了冲突。当时因天气突变,飓风大作,明使与日倭双方因护舟而发生了争夺。其结果是日倭用刀砍伤明使首役一人,血流淋漓,引得明使人员“众遂大怖,扶归哀诉,状颇仓皇”。明使一行虽验出首役受伤是因刀背而无大碍,但结果也不得不对日倭作出让步,将众役收入馆内,并且让琉球馆伴取教谕日人,以求达到“倭众必不为祸”的目的。此次冲突中明使一行明显的占了下风。因此在此后的“日东交易”中,明方也只能是处处加以防范。一方面以“胡越一家,倭人吾人耳,各事乃事,其勿拒”来要求琉球方面,另一方面又要求自己人“禁弗与通”^③。正是因为明方使行人员在琉球真实地感受到日本势力的强大以及明势力的相对弱小而得出了“琉球距日本咫尺尔,朝鲜失,则琉球难独存;我东南之地,且与夷逼,前所讹言将亦可为顾虑”的担忧^④。

正是因为明朝势力在与日本的比较中在琉球国显示出下风的趋势,因此明后期在对琉球政策上也出现了变化,即由以前的积极发展琉中宗藩关系以及支持琉球的朝贡贸易改变为消极地处理琉球问题和对琉球的朝贡贸易加以严格限制,以此来削弱日本人在琉球朝贡贸易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

因此,当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战争一爆发,闽抚台就要求停止册封琉球国王,而且当时国中的许多人都主张停止对琉球的册封。如万历四年出使琉球的副使谢杰当时就持此种姿态,请求停止册封^⑤。而到了夏子阳册封之后,明廷更积极主张要从经济贸易上来限制琉球的贸易,以达到削弱日本在琉球势力的目的。

① 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1。

② ③④《使琉球三种》,《使琉球录三种诸家》,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版,第279、218、171页。

⑤ 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使琉球录三种诸家》。

万历三十五年,当琉球国王请求“给引商贩,每年定以一、二只船……,例比东洋充饷”时,前册封使夏子阳和王士禛以太常寺、光禄寺卿的身份上书明廷,坚决反对。他们称“时往通商之议,断不可开”,“夫贵国素称贫瘠,既无物产可通贸易,又无资财可备积储;其所患者虽在于贫,而其所恃以为安者亦在于贫。”他们的计策是“贫可以安琉球”,让日本放弃对琉球的野心。而且他们还进一步告戒琉球:“若浮慕富国,议欲通商,托名来贵国,实与倭奴为市,非但隳禁长奸,将来遗中国之尤,窃恐争夺启衅,杀掠随之,一所谓‘延寇入室’亦非贵国所为□保之计耳。”^① 明方提出的对策就是削弱琉球的朝贡贸易,以达到既削弱日本,又保存琉球的双重目的。

明朝后期在处理琉球问题上的对策虽不无消极成分,但却击中了日本的要害。因为日本萨摩藩的一切活动都是出于追逐琉球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利益。这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很好的说明。万历三十三年,夏子阳一行刚到琉球时,岛津家久就派遣鸟原宗安到琉球,并且带去了两封信,一封给琉球国王的,另一封是给大明天使的。在给国王的信中,对琉球施加恫吓,称:“日本六十州有源氏一将军,以不猛之威发其号令,尺土无不献其方物者,一民无不归其幕下者……况家久为国王宗主官不述年年之职乎? 贵国亦致聘礼于我将军者,岂复在人之后哉?”另外,要求琉球充当中介勾通日本与大明的经济贸易往来,书称:“且复贵国之地,邻于中华,中华与日本不通商舶者三十余年于今矣。我将军尤之之余,欲使家久与贵国相谈,而年年来商于贵国,而大明与日本商贾通货财之有无。若然则匪翅富于吾邦,贵国亦从其富润屋,而民亦歌于市……岂复非太平之象哉?”^②

万历三十七年,萨摩藩感觉到与大明无法建立经济贸易交往关系后,于 1609 年侵入琉球,将国王尚宁以及坚决抵抗日本势力的郑炯等劫往日本。这一行为更加激发了明廷对琉球的经济贸易封锁行为。万历四十年,明方改琉球为十年一贡,后于天启三年(1623)改为五年一贡,其目的都是出于限制日本在琉球的势力。其所运用的策略虽然趋于保守,且不利于琉球从日本势力中解脱出来,不利于强化中琉宗藩关系,但在客观上起着对琉球的日本势力加以打击的目的。因此,当津久将琉球王一行劫持到江户后,江户幕府马上又将尚宁等放回、并且加以厚待的事实表明,日本江户幕府这一时期对琉球并无多少兼并的奢望,对与明朝的贸易交往照样非常重视。其具有野心的是萨摩藩,它在攻入琉球后,马上派出奉行 14 人及随行人员 168 人进驻琉球,并且对琉球及其岛屿上的所有土地进行丈量,并将琉球原有领土鬼界岛、德之岛、大岛、水良部岛与

论岛暗中纳入了岛津的领土。而且岛津氏没有将自己丈量琉球土地的情况报告给德川幕府,也没有向幕府的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报告,一直隐瞒到 1634 年,才向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报告。日本萨摩藩对琉球的直接入侵,进一步推进了明朝对琉球实行的贸易控制政策,而且对琉球的宗藩关系也变得更为消极。万历四十年,浙江总督杨崇业向明廷汇报了日倭侵入琉球事件,要求“宜教海上,严加训练”,而兵部对于杨崇业这一滞后的报告不表满意。因为兵部探知日倭入侵琉球获中山王在三十七年三月,而现在已经过了二三年时间。而后福建巡抚丁继嗣奏报琉球国王已经被释放回国,并派遣柏寿、陈华进贡,以修贡职役,同时提出了对琉球宗藩朝贡关系处理上的新策略。首先,他对琉球国身份有了新的认识,认为琉球国已经成了日本萨摩藩的附庸,失去了自我活动的自由。他称:“臣窃见琉球列在藩属,固已有年,但尔来奄奄不振,被拘日本,即令纵归,其不足为国明矣。况在人股掌之上,保无阴阳其间!”其次,他基于对琉球已经受到日本奴役这一事实的认定的基础上,对琉球此次朝贡贸易活动的履行者是否为琉球自身表示怀疑,即认为此后的贸易非琉球人同明朝为保持宗藩关系而进行的活动,而是在日人操纵下的商贸行为。他称:“且今来船方抵海坛,突然登岸;又闻已入泉境,忽尔扬帆出海。去来悠忽,迹大可疑。今又非人贡年份,据云以归国报闻;海外辽绝,归与不归,谁则知之! 使此情果真,而贡之人境有常体,何以不服盘验,不先报知,而突入会城! 贡之尚方有常物,何以突增日本物于硫磺、马、布之外? 贡之贡进有常额,何以伴多至百余名? 此其情态,已非平日恭顺之意,况又有倭为之驱哉!”出于对以上两点判断与推测,他提出了对待琉球的新策略,即尽力缩减琉球的朝贡与贸易活动,来达到“壮天朝之威,正天朝之体”的办法。他称:“宜留正使及人伴数名,候提请处分;余众量给廩食,遣还本国。非常贡之物,一并给付带回;始足以壮天朝之威,正天朝之体。”^③ 而对于如何巩固明朝在琉球的宗主权以及帮助琉球摆脱日人的控制方面却没有任何见解和方略。

在丰臣秀吉和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明朝自身实力在朝鲜半岛受到削弱,以及东北地区女真势力的壮大等诸多因素作用下,明廷开始将政策的重心全面转

① 杨亮功等主编:《琉球历代宝案选录》上,第 43-44 页。

② 《影印本异国日记》,金地院崇博外交文书集成,东京美术版 1989 年版,转引自何慈毅:《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第 50 页。

③ 周煌:《琉球国志略》第 79-80 页。

移到国内。这不得不促使它对琉球的宗藩关系进行了调整,在处理琉球宗藩关系问题上出于限制日本势力的目的,开始实行对琉球严格的贸易限制制度。它虽在主观上表现出消极与退让的趋势,但是在维系明朝的宗主权和保持中琉宗藩关系等方面仍然作出了许多努力,且无任何退让的迹象。中琉双方虽都遭到日本势力的影响,但是双方在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时仍然不遗余力。

就明朝而言,它在履行宗主国的权利时表现得仍然出色。在日本丰臣秀吉和萨摩藩侵入琉球、在琉球占有绝对的军事、政治、经济优势的情况下,明廷仍于1605年(万历三十三年)、1629年(崇祯二年)派出使节,对琉球国王进行正式的册封,以履行自己的宗主权。而琉球也一样,它虽然受到日本萨摩藩的束缚与控制,但是它在明末的任何时间里都没有放弃自己属国的义务。琉球方面履行属国对宗主国的义务可谓不遗余力。这种义务的履行主要表现在应明朝的要求或者自身的需要向明朝汇报“倭情”方面。万历二十年九月,琉球国应明朝的要求,向明廷飞报“倭情”称:“即行方外所属山口山地方,查得声闻关白自王,造船万只,倭国六十六州分备盘粮,各驾船只。限以本年初冬路经朝鲜,入犯大明事情飞报”^①。万历二十六年,琉球再次向明朝通报倭情,称:“本年三月十二日,敝国侦探得关白在博多地方纠集人众,议同六十六州船只,搬运粮米,人寇大明,理合遣人报告。”^②万历二十六年十月初三日,琉球国再次报告倭情,称“关白于本年七月初六日身故”^③。由此可见,琉球国在当时虽然遭到日本萨摩藩的控制,但对其自身的属国“屏周”的义务并没有放弃,这一义务一直至明朝灭亡才告终止。

(三)、明朝后期的日琉关系及变化

明朝后期,日本对琉球的控制日益加强。万历十六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命令萨摩藩僧致琉球国王书,“征琉球入贺,并献地,奉正朔”。它是日本对琉球实行武力征服的开端。万历十九年,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后,“檄萨摩,征琉球派兵从役”。因为琉球国小,无兵可派,改为输粮,要求输七千口十月之粮。琉球穷困,所输不及半。当明朝封闭了东南海口、断绝了与日商的往来,萨摩藩感到与明朝通商无望后,于万历三十七年派桦山久高侵入琉球,俘获了琉球国王与坚决抵制日本的郑炯,日琉关系自此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巨大变化。

首先,琉球方面主动放弃了对日本的抵制,采取与日本合作的政策,而且在国内也产生了亲近日本的势力。万历三十八年(日本庆长十五年)八月,琉球国王被岛津家久带到江户,在岛津家久的压制下向日本将军称臣进贡。其贡书如下:

琉球国王同道子て……府フ参着,同八日仰人よりて口誠献进所口对面あり琉球国王鞭子百端,猩红皮十二副乃,太平布二百皮匹,银子千枚,大刀一腰を进上。す十八日口振翁被下口被口付貞宗の口腰物同……廿日,家久……^④。

同时,国内人民在日倭武力威胁下,也放弃了对日本的抵制。日人桥本德有则在《古琉球吟》中称:“庆长中,三司官郑炯,不平岛津氏;港口三重城,屋良座建炮台,以备之,戍以兵。岛津军至,轰发不利,国歎身杀。由是国中尽废兵,日国小置兵,自足之国,不如以柔克刚,即大谕国中,以礼让自固。禁身带寸铁,炮台后竟托于岛津氏,而备不虞也,今已废址焉。”^⑤即当国王被俘后,琉球国从总体上对日本放弃了全面的抵抗,采取顺从受之的态度。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琉球国内也出现了亲近日本的官方势力,正是在这些亲日的官方势力的支持下,琉球国王才作出了“国中尽废兵”、“以柔克刚”的决定,和出现“炮台竟托于岛津氏”的局面。而其他方面的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明末清初的尚向贤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中山世鉴》中非常鲜明地表露出自己的亲日立场,他称:“先是,……大日本永享年中,琉球国始为萨州太守岛津氏附庸之国,朝贡于日本百有余年也。”又称:“尚宁慎终悖始,恐惧之心,日驰邪僻之情,转恣用,聚敛臣,一邪名而失事大之诚也。故庆长己酉萨州太守家久公遣桦山权左衙门尉平田太郎,左衙门尉率兵征伐琉球……又遣阿多氏……上井氏等正经界,均井地矣,始有伍我田畴,褚我衣冠之谤,终有我教子弟,我植田畴之颂矣。”^⑥以上尚向贤不仅将日本幕府赐萨摩藩琉球一事篡写为琉人共知的行为,而且认可万历三十七年萨摩藩入侵琉球,视萨摩藩为救世主。竟然称这一侵略行径为:“始有伍我田畴,褚我衣冠之谤,终有我教子弟,我植田畴之颂矣”。而且将国王抵制日本的侵略说成“慎终悖始,恐惧之心,日驰邪僻之情,转恣用,聚敛臣,一邪名而失事大之诚也”。由此可见,在明末清初之际,琉球国内亲日势力日渐嚣张,从而使久

① ②③ 杨亮功等主编:《琉球历代宝案选录》上,第8、8、250页。

④ 《琉球往来》卷1,抄本,殷梦霞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627页。

⑤ [日]桥本德有则:《古琉球吟》“那霸”,殷梦霞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下册,第955-956页。

⑥ [琉球]尚向贤:《中山世鉴》,抄本,殷梦霞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下册,第851-852页。

米村、首里的三十六姓人的后代,在政治上、官场上、外交上受到了琉球与日本的双面钳制,这可能是导致三十六姓人在明末清初日渐削弱的重要原因。

日本萨摩藩对琉球控制的加强,以及琉球内部亲日势力的强大,最终使得琉球国王成了亲日势力的傀儡。萨摩藩通过控制琉球的三司官,使他们成为向琉球和萨摩藩两面效忠的佞臣。他们一方面代表国王执政,另一方面又为日本服务,监视国王的言行。

日本萨摩藩虽然实际上控制了琉球,但是明末清初之际,琉球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且与日本相平衡的国家主体。萨摩藩对琉球的控制主要是在经济上的剥削,因此萨摩藩虽然有足够的军事、政治实力控制、吞并琉球,但是却没有否认琉球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萨摩藩将琉球当成附庸国,主要是出于经济掠夺的目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在明末清初之际对琉球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不在于窥窃琉球整个国家的国土,也不在于意图吞并琉球王国,而是力求通过这一控制从琉球获得同中国朝贡贸易等方面的经济实惠。况且当时萨摩藩的野心还是受到江户幕府的压制的。江户幕府不希望萨摩藩吞并琉球,变成东南部的大藩,更不希望它尾大不掉,威胁幕府的统治。因此,就明末清初整个时期而言,萨摩藩多是从暗中操纵琉球的贸易,攫取琉球的经济利益,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就日本幕府而言,这一时期并没有吞并琉球的野心。日本江户幕府在萨摩藩入侵琉球、俘获国王后,并没有吞并琉球或者将之臣属于己的意思。相反,琉球国王一行到达江户后,幕府将军却将他们看成上宾。而且将军秀忠向琉球国王作出了以下承诺:“尚氏世代为琉球国王,现在应速速回国,祀奉祖先,仰本朝之威德,将其国家传子孙。”^① 此举表明,此时的江户与琉球之间的行为仍然是平等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行为。江户当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如上所述,出于防范萨摩藩的目的,限制萨摩藩的势力。第二,与江户想恢复与明朝的贸易交往密切相关。因为在同年,江户幕府经过中国商人周性如一行向明朝传递国书,提出“今将继续前时之绝,而兴比年之废,欲修遣使之交,而索勘合之符”等要求,即江户幕府想与明朝恢复旧有的交通关系。就这一点上讲,它没有理由与明朝争夺对琉球的宗主权,更没有理由兼并琉球国。只是萨摩藩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对琉球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而萨摩藩为了获取从中国的贸易利润,也没有必要吞并琉球,相反却刻意地掩饰自己在琉球的活动。如日本宽永中,家久因府库空乏“使其臣蓄发,变易姓名,扮琉球人与其国使者共赴福州贸易,赏购布棉等类以归,日本所谓御丝荷者也。”^②

三、明季中、日、琉球关系之小结

明朝是中国与琉球建立宗藩关系的重要时期。明初政权在国力强盛之时,积极地同外国建立联系,同时也与自己周边的国家建立宗藩朝贡关系,这一关系对推动明朝时期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明朝能够突破中国传统的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领域囿于大陆的局限,积极地将国家活动领域向海外拓展。这一行为本身有利于中国这一农业型大国克服海洋的局限,向外发展自己。有明一代,琉球、朝鲜、安南、暹罗等国使节多次到明朝贡方物,而且明廷也派出册封使到重要的属国进行册封。这一朝贡册封为纽带的活动带动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经济贸易发展与交往。以大明为中心和中枢的朝贡贸易推动了整个东亚地区的繁荣与和平。

但是明朝对周边各国的招徕、册封的更重要的出发点是源于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威仪与“化外之人”的荣誉与理想,而非出于振兴自身经济、发展与属国的交往、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当万邦来朝后,明朝自身却迷醉于上国的虚荣之中,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属国的朝贡,而自身却退出海洋,让属国经受海上的风险与机遇。同样它在对待琉球属国上也一样,以一种非常超然的心态看待琉球的来朝。

正是因为明朝以中原文化自居,以华夏文明自大,以天下共主身份为荣,以君临天下的超然心理为对外邦交的依托,反而造成了自己在发展属国关系上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停滞不前的被动局面。这一被动局面随着属国所遭受危机的增强而增强。因此当琉球遭受到日本萨摩藩的入侵与控制时,明朝只能采取退缩的做法,而无积极的进取精神。

作者简介:柳岳武(1978—),男,安徽安庆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责任编辑:陈 瑞

① 《德川实纪》第 1 编,转引自何慈毅:《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第 55 页。

② [日]稻叶君山著、但焘译:《清朝全史》,台湾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00 页。

明朝时期中、日、琉球关系研究

作者: 柳岳武, [LIU Yue-wu](#)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 北京, 100872](#)
刊名: [安徽史学](#) PKU CSSCI
英文刊名: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NHUI](#)
年, 卷(期): 2006, ""(4)
被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36条)

1. [Peter Duus](#) [THE ABACUS AND THE SWORD-The Japanese Penetration of Korea, 1895-1910](#)
2. 《明宣宗实录》卷32, 宣德三年二月条
3. [黄省曾](#), [谢方](#) [西洋朝贡考](#) 1984
4. [茅元仪](#) [武备志](#)
5. [何慈毅](#) [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 2002
6. [潘相](#) [琉球入学见闻录](#) 1973
7. [周煌](#) [琉球国志略](#) 1969
8. [杨仲揆](#) [中国·琉球·钓鱼台](#) 1972
9. [潘相](#) [琉球入学见闻录](#) 1984
10. [王鸿绪](#) 《明史稿》, “外国列传琉球传” 1988
11. [杨仲揆](#) [中国·琉球·钓鱼台](#)
12. [蔡世昌](#) [久米村记](#)
13. [潘相](#) [琉球入学见闻录](#)
14. [周煌](#) [琉球国志略](#)
15. [伊藤松](#) [邻交征书](#) 1975
16. [瑞溪周讽](#) [善邻国宝记](#) 1984
17. [佐佐木银弥](#) [海外贸易和国内经济](#) 1971
18. [竹内理三](#), [沈仁安](#) [日本历史辞典](#) 1988
19. [杨亮功](#) [琉球历代宝案选录](#) 1975
20. [杨亮功](#) [琉球历代宝案选录](#)
21. 《明史》卷332《日本传》
22. [相田二郎](#) [日本の古文書](#) 1949
23. [何慈毅](#) [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
24. [胡宗宪](#) [筹海图编](#)
25. [使琉球三种](#) 1984
26. [谢杰](#) [琉球录撮要补遗](#)
27. [杨亮功](#) [琉球历代宝案选录](#)
28. [何慈毅](#) [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
29. [何慈毅](#) [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
30. [周煌](#) [琉球国志略](#)
31. [杨亮功](#) [琉球历代宝案选录](#)

32. 殷梦霞 [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 2002
33. 桥本德 [《古琉球吟》“那霸”](#)
34. 尚向贤 [中山世鉴](#)
35. 何慈毅 [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
36. 稻叶君山, 但焘 [清朝全史](#) 1985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元华 [中国人日本留学史料补遗一兼谈日本亚细亚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教育](#) -日本学论坛2004, ""(4)
笔者在日本亚细亚大学任教期间,通过资料查询和走访调查,发现了被我国中日关系史及留学日本史研究界忽视了的有关日本战后首批正式招收中国留日学生的史料。史料证明,战后第一批留学日本的是中国香港地区的学生,这既是中日两国在战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也为战后日本亚细亚大学的成立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①
2. 期刊论文 徐习文, 谢建明. XU Xi-wen. XIE Jian-ming [从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看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2)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属于“支那史”、“东洋史”的分支;冈仓天心的中国美术研究较明显地带有军国主义思想的印记;即使比较纯粹的学术研究的木村西崖等采取西方科学研究方法,将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相结合,准确地判断中国美术品的价值和地理分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为日本掠夺中国珍贵文物资源奠定了基础。由此,从日本的中国美术研究亦可窥见日本侵华的图谋。
3. 期刊论文 丁志强, 杨伶. DING Zhi-qiang. YANG Ling [一战后日本亚太战略的中国因素分析——以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修改为线索](#) -日本问题研究2009, 23(4)
日本乘一战之机,在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南、北两个方向上,初步实施了其对亚太地区的扩张战略。但一战后的华盛顿体制全面否认了日本的在华“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并对以后日本的扩张施以种种限制。为摆脱国际压力,日本于1923年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二次修改,明确提出了将美国作为其军备的目标,同时,也要保持对中国的威慑。但实际上,中国始终是日本所认定的首要攻击目标。即使是对美俄作战,也必须先征服中国,以获得战争的资源 and 作战基地,提高战争能力。为此,1926年,日本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对华作战计划。
4. 期刊论文 杨彬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以日本汉文小说为中心](#) -明清小说研究2005, ""(1)
从东亚历史上汉字文化圈的背景来看,中国文化一直是古代日本学习和模仿的典型。作为中国文学之一翼的中国古代小说,对于日本小说,乃至整个日本文学产生过巨大冲击和影响,这种影响的顶点,可以日本汉文小说为代表。日本汉文小说是日本小说作家以汉字为叙述语言,描述日本本民族故事、反映日本人民民族感情的一种独特创作。其作者及作品在民族及国别上的“越界”行为,使它天然地具有了双重的“外国文学”的属性,即对中日两国来说,似乎都是外国文学。近年来,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对域外汉文学研究的重视,中国小说在日本的流播与影响,以及它在异域的传承——日本汉文小说都逐渐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处于文化强势地位的中国小说对域外小说强大的影响力,于此也显露无疑。
5. 学位论文 白华 [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的考察与研究](#) 2006

中医古籍的外传,推动了周边国家传统医学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国外翻刻的特殊形式(或曰版式)的中医古籍。“和刻”(日本刻本)中医古籍即是其中的一种。传入日本的中医古籍,不但将先进的中医药知识和经验带进日本,并且通过“和刻”这种形式在彼邦得到了良好的保存、翻刻和研究。尤其是在日本江户时代,和刻中医古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促进了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这些和刻中医古籍在清代及其以后又部分地返传中国。返传的和刻中医古籍中,包括部分中国失传已久的珍贵医籍,对中医药理论知识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对返传中国的和刻中医古籍尚未见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将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目录学、版本学等方法,对其现存数量、种类、特点以及分布情况进行量化的统计分析,以期系统地了解 and 和刻中医古籍的发生发展历史,为更好地发挥国内和刻中医古籍的作用提供条件。

本文以1991年出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为基础,根据本文拟定的考察对象范围,将其中的和刻中医古籍整理出来,辑为《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目录》,以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和分析。为了更全面地收集和刻中医古籍的相关资料,笔者于2006年3月赴日本茨城大学进行了实地学习和考察,收集了当地和刻中医古籍的相关资料。

本文主体分为4部分内容,分别是:1. 中医古籍传入日本的简要回顾

2. 和刻中医古籍的产生与传播

3. 和刻中医古籍返传中国的时代和途径

4. 国内馆藏和刻中医古籍概述

此外,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和刻中医古籍对中日两国传统医学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借以对和刻中医古籍进行历史的评价,并呼吁重视对和刻中医古籍的研究。

本文所云“和刻中医古籍”指的是中国医家编撰的、传入日本并经过日本刻印出版的中医类古籍。这类和刻本底本属于传入日本的中医古籍,或以原书基本内容为主,保持原书基本结构框架,辅助性地增加假名训点、眉批、旁注、序跋等内容。

文章先简要回顾了中医古籍传入日本的过程。中国医学流传到日本主要是通过两国人员和书籍的交流进行的。公元562年,吴人知聪经由朝鲜将164卷中国典籍以及佛像、乐器等带到日本,其中包括最早东传的中医药文献《明堂图》。中日之间以书籍为媒介的医学交流自此开始,直到江户时代末期从未间断过。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遣唐使、入宋僧和往返于两国间的商人,源源不断地将承载着中医药知识的书籍传入日本。而日本的医学界视书籍为老师,经过上千年不断地钻研学习,逐渐理解吸收了中医医学的主要精华,并融合本国的医学经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汉方医学。

中医古籍流播日本可粗分为早期(江户时期以前)和江户时期两个阶段。隋唐时期,日本积极移植引进中国文化,随着向中国派遣“西海使”(隋代亦称“遣隋使”,唐代亦称“遣唐使”),中日两国之间也开通了往返于海上的“书籍之路”。考察编成于885年~897年间的日本国家藏书目录——《日本国见在书目》,可以看出中医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早期著作,隋唐时期多已传入日本。另外,宋版医书传入日本是从日本平安末期开始的,第一本传入的宋版医书是《大观本草》,自公元1192年开创镰仓幕府之后,日本开始大量引进宋版中国医书。

江户时期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富有魅力的中国丝绸、纺织品、药品及书籍等却源源不断地通过长崎运往日本。据日本学者真柳诚统计:江户时期有传入记录的中国医书除去版本等的差别外共计804种,涉及医方、本草、伤寒、金匱、内经、针灸和痘疹等各个方面。从这些医籍的传入时间来看:江户时代除受到“迁界令”影响的二十年间传入医书数量骤减外,其他时期没有明显的起伏变化。通常的传入记录为每十年60~110次,中期1711~1730年和后期1831~1850年的各二十年间出现了两次高峰。考察这一时期传入医书的成书年代,大部分是明清时期的著作。特别是明代医书传入后被大量翻刻,对日本医学发展的影响很大。

随着中医古籍大量东传日本,江户时期医籍的翻刻事业也逐渐兴盛起来。关于和刻中医古籍在日本的产生与传播过程,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论述。首先介绍了和刻中医古籍兴起的时代背景,重点叙述了江户时期中医古籍的和刻情况,并举出有代表性的和刻中医古籍加以辅助说明。

江户初期,西方和朝鲜的活字印刷技术先后传入日本,促使日本的印刷刊刻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京都、大阪、江户等地,至江户时代后期,医书的刊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和刻中医古籍最初以日本古活字本为主,大约兴盛50年后转向采用整版印刷技术,并且逐渐开始重视版本的质量和校

勘工作。

据统计：江户时期有传入记录的804种医书中，314种曾经和刻出版过，出版次数达到679次。约半数左右的医书出版于江户前期，尤其集中在内容难解的“内经”以及技术高难的“针灸”方面。从江户中期开始，日本传统医学逐渐走向本土化，日本医家的著作出版增加，与此同时和刻版中国医书需求量减少。后期受到“古方派”的影响，为了翻刻宋以前及清代关于《伤寒论》的著作，和刻版稍微有所增加，但未形成规模。日本是中国周边国家中，输入和翻刻中医古籍最多的一个国家，加之日本历代对医书十分重视，妥善加以保存，往往藏有中国已经失传的医书。早在公元1092年，北宋政府就通过高丽使节带回了一些当时中国失传或罕见的中医古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天汉文洋”之风的影响下，许多汉方医学馆和刊物停办，学术研究一蹶不振，学派气势已衰落。中医古籍也因此不再受到重视，大部分封藏在图书馆中，还有一部分流散于民间。清末以杨守敬、李盛铎为代表的学者们，积极赴日购回中医古籍。通过他们的努力，大批濒临失传的古医籍回归到中国。近几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关注海外现存的散逸古医籍，从日本回归了大批有价值的文献，保证了中医古籍的传承与研究质量。

考察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本文主要从数量、种类、返传比率以及分布特点几方面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目前国内馆藏和刻中医古籍221种，考虑版本差异共有448版次。其中，有明确和刻年代记录者共为184种、332版次，刊刻年代大部分限于日本江户时期。这些和刻中医古籍涉及医经、基础理论、伤寒金匮、诊法、针灸推拿、本草、方书、临床各科、医案医话、医史和养生等十几个方面，其中“临床各科”类占整体的32.4%，“方书”类占17.6%，“伤寒金匮”类占12.5%。

考察中国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的刊刻年代，呈现出江户前期刊本数量最多，后期出现小高峰，而中期最少的特点。这一结果与真柳教授所调查的江户时期中国医书翻刻状况相一致。另外，笔者还发现返传中国的和刻中医古籍虽然数量有限，但种类非常丰富。返传和刻中医书的种类占总体和刻医书种类的60%左右。其中返传比率较高的“内经类”、“伤寒金匮类”和“针灸类”达到70%以上，“本草类”和“痘疹类”相对较少。由此可见，在回归和刻中医古籍时收集者基本没有偏颇地进行收罗，但避免同一种书籍的重复，尽量返传更多种类的和刻中医古籍。

对比江户时期和刻次数与返传次数前十名的和刻中医古籍，结果有7种相一致，分别是《伤寒论》、《难经十名》、《金匮要略方论》、《医方大成论》、《十四经发挥》、《万病回春》、《素问玄机原病式》，可见中日两国医家都对这些经典著作较为重视。另外，日本医学家将中国熊宗立的《医方大成》摘去其中的论说，编成《医方大成论》，在日本广泛刊行，并返传中国很多版次。可是这些版次很少被中国再次刊行，此书在中国始终流传很少，由此说明中日两国医家的着眼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返传中国大陆的和刻中医古籍主要收藏于全国23个藏书机构，分布在7个主要城市和地区。其中北京地区最多，共计380部；其次是上海地区，共计154部。另外，中国东北地区、江浙一带以及天津所藏也较丰富。藏和刻中医古籍超过10种以上的地区还有四川省。

返传的和刻中医古籍不但种类齐全，而且其中不乏珍本秘籍。如：随“遣唐使”东传日本的《真本千金方》，保存了未经宋代改动的原貌，版本价值极高，目前已经回归中国，保存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等5个藏书机构中。另外，考察《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仅存和刻版本的医书有17种之多，这些医书全部是依靠和刻版本在中国传承下来的。除此之外，中国以返传的和刻医书为底本，出版了若干版本质量较高的医书，如：《康治本伤寒论》、《黄帝虾蟆经》、《儒医精要》等书。

现有考察结果表明，和刻中医古籍产生于日本室町时代，在日本江户时期达到刊刻和流传高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和刻中医古籍逐渐衰落，其中部分版次随着中日两国间的医学文化交流返传中国。江户时期中医古籍的大量翻刻，不但促进了中国医学在日本的传播，还促使日本传统医学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汉方医学。返传中国的和刻中医古籍弥补了部分中国亡佚古医籍的缺憾。回归和出版这些返传的和刻中医古籍，将对中医药文献的保存、传承和研究发挥巨大作用。

本文以上考察研究结果，为了解国内馆藏和刻中医古籍的收藏地点、数量和学术价值提供一定参考。和刻中医古籍的返传，对当代中医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本文研究的结果，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对和刻中医古籍的重视，进一步加强对此类中医古籍的保管和收集，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条件。

6. 期刊论文 杨彬、吴佳娜 中国古代小说与古代日本汉文小说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37(6)

日本汉文小说是日本小说中一个独特的类型。它们是日本小说作家以汉文字为叙述语言，描述日本本民族故事、反映日本人民民族感情的一种独特创作。多年来，由于这种小说形式上的“汉化”和内容上的不相一致，致使它们同时被排斥在中国和日本小说的研究视野之外，其面貌不为人所知。事实上，它们虽然从文学疆域划分的角度上属于日本，但无论其语言风格、文体形式，还是小说旨趣等等，它们又的确深受中国小说的深刻影响，甚至是自觉模仿。这一切，显示了处于文化强势地位的中国小说对域外小说强大的影响力，及其在文学交流中不可取代的价值。

7. 期刊论文 真柳诚 日本江户时期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 -中国科技史料 2002, 23(3)

江户时期，中国医学知识大多通过书籍传到了日本，其中部分书籍凭借和刻(日本刻)版，在日本普及并被广泛接受。作者对传入的中国医书及其和刻版进行了调查和比较分析，因为该方法有可能历史地、量化地把握中国医学传入和被一般社会所接受的实际状况。结果如下所述：有传入记载的中国医书为804种、1917次，这些均为在中国流行、部头大，并能以高价售予日本的书籍。中国医书的和刻版为314种、679次，约半数出版于江户前期，尤其集中在内容难解的“内经”及技术高难的“针灸”方面。单经(白文)本在注释本发行40-50年之后有和刻。从江户中期开始，随着医学的日本化和日本医书的出版增加，中国书的和刻版急剧减少。所有传入医书约40%有和刻版。50年内从传入至和刻的比率高达46%，这种时间差越在江户早期越短。早在江户前期，和刻版中的畅销医书已经是3卷以内的薄册，且大多与当时中国的流行医书或最新医书无关。另外，在整个江户时期，也有从大部头书中拔粹或摘编的现象，由此可窥知日本特色的小型化嗜好。据此，日本在江户时期，从自身角度接受了中国医书，并进而接受了中医学，同时加以日本化。

8. 会议论文 王亚雷、小平、李德义 中国茶叶在日本 2001

近20~30年里，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先后流行三次中国茶，每次都有助于中国茶叶在日本的推广，有助于中国茶叶文化的弘扬。在日本各地不断地有新的中国茶店(馆)开业，同时，不仅中国餐馆连一些日本料理店也增加了中国茶的服务。饮料公司在日本茶水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断生产出各种易拉罐茶饮料。中国茶叶出口到日本的品种有青茶(乌龙茶)、蒸青绿茶及红茶和名优绿茶，其中以乌龙茶的量为最多(1.5万~2万吨)。随着日本人民对中国茶叶的认识的深入，中国茶叶市场将会越来越大，对品质和花色品种的要求也会提高。

9. 期刊论文 李颖、王洪波 西学东渐与日本文艺学的近代化转型——兼谈日本文艺学对中国的影响 -时代文学(双月刊) 2007, ""(1)

西学东渐以来，日本在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为东西方思想的交汇点。在文艺学领域，日本文艺学的近代转型，勾勒出近代以来日本艺术精神与西方艺术精神交流并得以完善自身的脉络或轨迹，同时在理论的深度、广度以及意识的自觉性等方面都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国。这也造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日本在中国吸收西方文艺理论的过程中发挥了“中间人”的作用，对中国文艺学的近代化转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0. 学位论文 张世响 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从绳文时代后期到平安时代前期 2006

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原始和古代社会，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以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为主要特征。日本内藤虎次郎博士形象地比喻过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民族进化的点化作用：“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日本民族好比是豆汁。中国文化好比是卤水。日本民族与中国文化一经接触，立即变成了豆腐。”<①>

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世界各民族一样，日本有其独特的文化。原始日本人在岛国特殊地理环境下，创造了日本固有的原始文化，即持续数千年的绳文文化，这表现出岛国环境下形成的日本文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时，日本文化又具有开放性和受容性，这主要表现在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上。绳文时代后期，当日本人最初接触到中国文化时，他们的态度是积极吸收。他们积极接受先进的中国文化，并在绳文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新的文化，即弥生文化。纵观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在明治维新运动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之前，各时期的日本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日两国学者就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做过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研究状况来说，迄今为止的研究，在研究资料的使用上，多以中国史籍记载为主要依据。在研究的角度上，多从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入手。在研究的时段上，多注重对隋唐及其之后的中国文化交流研究；因为隋唐及其之后，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多，而且资料比较丰富。相比之下，直接使用日本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从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角度入手，对日本原始时代和古代进行的研究则比较少，研究成果也不多。

本文则主要运用日本资料，从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接受入手，去研究隋唐之前，即日本绳文时代后期至平安时代前期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探讨认为，日本在接受中国古代文化的过程中有如下三阶段的变化：

绳文时代后期至弥生时代前期坐等接受，原封不动地加以吸收和利用。绳文时代后期，以箕子东迁朝鲜半岛为契机，中国文化东传到朝鲜半岛，其影响波及

日本列岛，日本开始接触、接受中国文化；接下来，又有徐福东渡日本和卫满东移朝鲜等移民活动，中国古代文化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列岛。当时的日本，正处在绳文时代晚期和弥生时代早期，其文化仍落后于中国，因此，当先进的中国文化“主动送上门”时，好学的日本民族采取的态度是来者不拒，原封照搬。当然，最初接受是一种被动的接受，凡是传到日本的中国文化，几乎都原封不动地被吸收和利用。例如：水稻及其他粮食作物的种植技术，铁器、青铜器等金属工具的制造与使用技术，养蚕、纺织、制衣等技术，诸如此类的先进文化，都被日本一一接受下来。这些先进的中国文化，都是公元前中国的箕子、徐福、卫满等移民们陆续地、直接或间接地传到日本的。弥生时代中后期主动摄取，有选择地摄取。感受到先进文化的优越性之后，从弥生时代中、后期开始，日本人已经不满于仅仅在家门口等待传来什么就接受什么的状态，于是，开始主动走出国门，积极寻找并摄取中国文化。如：公元57年，倭国向东汉派出了使者；后来，倭女王卑弥呼多次遣使与三国时的魏国交流；大和时代，为了建立统一国家，倭“五王”频繁与南朝刘宋政权交流，遣使朝贡，请求“除授”和“册封”；同时，还聘请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博士、官员等前往日本，传经送宝。这期间，日本还摄取、接受了汉字、儒学、汉化佛教等中国文化。到了飞鸟时代，建立了统一国家之后的日本，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日本统治者，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者，以“多得文书宝物”为目的的遣唐使把主动摄取中国文化的浪潮推到了顶峰。日本从本国各阶段的建设需要考虑，缺少什么就从中国摄取什么，并非不分良莠全盘照搬。即使进入了全面接受中国文化的奈良时代，也做到了该拒绝的决不摄取。如：中国古代的宦官制度，始终没有被动日本接受。

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边接受，边消化吸收，边发展创造。同本在接受、摄取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一直表现为在接受、摄取的同时，加以发展和创新。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表现尤为突出。大部分中国文化被接受后，都是先经过充分消化、吸收，使之日本化，之后，再使之成为发展、创造日本民族文化的养分。最后，创造出具有大和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化。如：奈良时代平城京的建造，律令政治制度的建立；平安时代假名的发明，和汉文学的交替变迁，等等。

关于上述内容，本文为上、下两编，计九章进行讨论。前五章为上编，探讨自日本原始社会中绳文时代后期开始到弥生时代为止，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情况；后四章为下编，探讨日本古代社会中从大和时代到平安时代前期，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以及在接收、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创新等方面的情况。

上编，绳文时代后期(公元前1000年前后)，正值中国的商末周初。以箕子东迁朝鲜半岛为代表的中国移民，把中国文化带到了朝鲜半岛。同时，其影响波及日本列岛，从而为日本接触、接受中国文化创造了条件。接下来，绳文时代晚期，以徐福东渡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中国移民，先后经过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带去了先进文化和技术，推进了日本文明化的进程。日本历史上出现了一种不同于绳文时代文化的崭新文化，即弥生文化。之后，公元前195年又出现了卫满率众逃亡朝鲜半岛的移民事件，这种逃亡性的移民事件到汉武帝灭亡卫氏朝鲜和设置“四郡”时达到顶峰。中国内地大量的民众迁到了朝鲜半岛，先进的中国汉文化移植到了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灿烂的乐浪文化一直存在到公元313年，几乎伴随了同本弥生时代的始终，故而对弥生时代的文化产生了不少的影响，促使同本社会大进步、经济大发展。弥生时代后期，日本产生了贫富差别，产生了不同的阶层，出现了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奴隶主和奴隶，出现了古代部族国家。部族国家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原始社会的结束和古代社会的开始。

下编，经过战争，许多的部族小国逐渐被统一为大和国，日本进入古代社会。大和时代(公元300年左右至592年)，初建国家的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文化上，各个方面都积极学习、摄取中国文化。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因积极学习、接受中国文化，被称为接受、摄取中国文化的先驱者；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正值中国的盛唐时期。日本采取选派遣唐使等多种方式，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汲取中国文化，几乎达到了全盘照搬的程度。可以说，此时期同本接受中国文化达到了顶峰。至平安时代前期，日本认为，唐文化的精华已经汲取殆尽，加之遣唐使费用昂贵等原因，于公元894年，停止了遣唐使的派遣。此后，日本大规模接受、摄取中国文化告一段落，转向重点对已经摄取的中国文化进行消化、吸收和发展、创新。具有大和民族特色的日本文化，就是这样在先进的中国文化的浸润、滋养中逐渐形成的。

本论文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

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本文从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角度切入，分析日本文化发展的历史，论证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对日本文明进程的影响。在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大前提下，在具体论证中采取了纵横交错、多管齐下等多种方式，在充分运用考古发现、民间习俗、神话传说等文献资料以及图片和口头资料的基础上，把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分三个阶段：一是被动接受阶段，二是主动摄取阶段，三是边接受边发展创新阶段。就此综合探讨论证日本接受中国古代文化的情况。

二、在研究资料的使用上，以日本的原始资料为主。如文中使用的考古、民间习俗、神话传说和图片资料等，大都是采自日本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适当使用中国方面的资料，如《史记》、《后汉书》、《三国志》等。

三、在研究观点上，本文主要有三个创新点：

(一)箕子东迁朝鲜半岛、徐福东渡日本和卫满东移朝鲜半岛，这三次大的移民活动，既直接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并波及日本列岛，更为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创造了前提条件。在当时的条件下，正因为有上述三次大的移民活动，中国文化才得以东传，日本才有接触和接受中国文化的可能。

(二)三次移民活动中，箕子和卫满到达的目的地主要是朝鲜半岛，徐福东渡日本时也经过朝鲜半岛；三次大的移民活动把中国古代文化首先传播到朝鲜半岛，然后再传播到日本列岛；日本最先与海外接触和交流也经朝鲜半岛中转。因此可以说，在航海线路开通之前，没有朝鲜半岛的中转，同本不可能接触到中国文化，更谈不上接受中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鲜半岛成为日本接受中国文化的桥梁。

(三)学界大多认为，日本接受中国文化是从弥生时代开始，或者从绳文时代晚期开始；根据最新考古结果，也有学者提出绳文时代后期，同本已经开始接受中国文化的观点，但是，却没有明确指出谁把中国文化传到日本。本文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民间习俗信仰等方面论证认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箕子东迁朝鲜半岛时，少量的移民已到达日本，中国文化的影响已经到达日本列岛。也就是说，公元前1000年左右，箕子东迁朝鲜半岛时，把中国文化传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日本才开始接触、接受中国文化。从而，为把同本接受中国文化的时间提前到绳文时代后期的观点补充了证据。

由于手头资料受限，加之本人才疏学浅，论文中肯定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有的问题尽管意识到了，但是没能展开研究，如：乐浪文化在同本影响的具体情况以及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三地间的文化传承和相互影响的情况等，都有待于今后继续探讨。

本文链接：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ahsx200604004.aspx

授权使用：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wfhzwxxy)，授权号：3a9dc68d-9499-4f3f-829e-9e59017ec071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27日